

# 论闽方言及其演变

李 纾

(澳门科技大学 行政与管理学院, 澳门)

[摘 要] 闽方言如何形成及何时形成, 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采用地名相关分析法和字音分析法对现有认为闽语当是由吴语演变而来的证据进行再分析, 结果表明, 两种方法均不难归集到支持“闽语是由吴语演变而来”和支持“闽语是由中原语演变而来”的证据。双方证据相对均衡, 从而并不特别支持“中原话为祖父辈, 吴语是父亲辈, 而闽语当属儿孙辈”之说法。

[关键词] 闽语; 中原话; 吴语; 地名相关分析; 字音分析

[中图分类号] B9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3)03-0065-09

约三年前, 有幸拜读了云惟利先生两篇相关论文:《从历史地理看闽语和吴语的关系》[1]和《海南闽语语词的来源及闽语和吴语的关系》[2], 文中娓娓道来的例证, 既明白又真切, 从而解开了笔者一些懵懂的疑团。这好比茶叶本是由中国输出的, 但是普通话“茶”【chá】的发音与英语 TEA [ti:]、德语 TEE[te:]、荷兰语 THEE、法语 TEE、意大利语 TE'、西班牙语 TE 发音相差甚远。有心人士即使生疑, 也未必有解。若有人从历史地理及语音方面告诉你, 福州话“茶”为【tò】、厦门话“茶”为【tè】, 依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 福州和厦门同时被迫辟为中国五个通商口岸之二口岸看, 就不难接上隔断的脉络。沿着这条思路, 就容易理解云惟利先生的推断: 闽语当是由吴语演变出来的。正因为闽语是笔者的母语, 而且笔者对吴语也耳熟, 细读数遍后, 萌生了将所思草成此文的念头。

## 一、语词地名相关分析法

闽方言, 又称闽语, 是汉语七大方言中与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差别最大、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个方言[3]。闽语是由中原话演变而来, 还是由吴语演变而来? 回答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件易事。一般公认的说法倾向于认为闽语是由中原话演变而来。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1994 年编辑出版的《语言文学百科全书》在论及“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时说:

今天的闽方言地区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汉人移居, 但人数尚少。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移入闽是在“五胡十六国”时代, 当时中国处于兵荒马乱之中, 北方汉人相率离乡背井, 播迁于大江东西、五岭南北, 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闽北以建瓯为中心的建溪、富屯溪流域, 闽东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以及闽南以泉州为中心的晋江流域。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南迁, 汉人进一步成了福建境内居民的主体, 他们带来的当时河南中州一带的中原汉语, 跟当地原有汉人所说的汉语乃至异族人所说的语言发生接触, 逐渐地形成了闽方言。今天所谓“十五音”

[收稿日期] 2002-04-26

[作者简介] 李纾(1956-), 福建福州人, 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教师, 新加坡新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学院哲学博士。中英文论文中已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或《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 16 篇, 被 SSCI 或 SCI 源刊引用 39 次。

系统的闽方言,它的源头或许就是东晋中原汉人入闽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3](p.113)

云惟利先生两篇论文《从历史地理看闽语和吴语的关系》和《海南闽语语词的来源及闽语和吴语的关系》支持“闽语是由吴语演变而来”的说法,且形象地将中原话、吴语及闽语的关系归结如下:“吴语和闽语的先祖当然都是中原话。如以中原话为祖父辈,则吴语便是父亲辈,而闽语当属儿孙辈了。中原话南下江浙,和吴越语及蛮语相融合,形成吴语;吴语再南下闽境,与闽地蛮语相融合,而为今日闽语的始祖。”

云惟利先生认为,福建自开拓以来,新移民主要来自浙江。这一层关系在福建的地名中当有反映。其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在福建多搜集到与江浙相同的语音、语词或地名,以证明吴语是源。为此,云惟利先生在文中已经列举了大量两地共有地名的实例。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证据如果越具有“排他性”,则越具有说服力。如,“埭”字为吴语,作垄、行解;或指一所平房内分前后几排的,一排叫一埭。笔者找出几个两地都带“埭”的地名:后埭(莆田)、埭头(莆田)、陈埭(晋江)、苏埭桥(泉州)、莲埭(石狮)、英埭头(厦门)、宓家埭(慈溪市),就远比烟台山(福州市)、烟台市(山东)更具有说服力。在云惟利先生的例子中,受山(海宁/邵武)、鳌江(平阳/连江)、兄弟屿(舟山/东山)、太姥山(新昌/柘荣)就远比青山(长兴/长乐、浦城、松溪、霞浦、南安),龙泉(龙泉/南安、上杭),蓬莱山、蓬莱顶(象山/尤溪)更具有说服力。

云惟利先生在《从历史地理看闽语和吴语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浦、埠、埔、阜、步在南方方言中,是同一语词。本义是水边高起的地方,通常指渡头。南方各地通用为地名。”为了证明移居地借用原居住地的名称,云惟利先生在文中举了12个福建地名以对应五个浙江地名:新浦(富阳、慈溪)、沙埠(淑江)、东浦(绍兴)、小浦(长兴)、南浦(太顺)。

浙江	福建
新浦(富阳、慈溪)	新埔(莆田) 新浦(松溪)
沙埠(淑江)	沙埔(福清) 沙布(顺昌)
东浦(绍兴)	东埔(古田、顺昌、石狮、厦门) 东浦(泉州)
小浦(长兴)	大埔(仙游、漳浦、华安、顺昌) 大浦(松溪)
大埔(松溪)	
大布(顺昌)	
南浦(太顺)	南埔(泉州、东山) 南浦(漳浦、福安)

然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一书中说:“埔为闽粤地区常见的通用名字。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处的一个统计资料,福建省带埔字地名又有1115处,广东省有1478处。‘埔’字在闽方言里,指大片的平地。其本字应当是先秦的面积度量单位‘夫’。《汉书·食货志》在追述周代井田制时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亩百称为夫,当然是大片平地了。在粤方言区,黄埔的‘埔’读布。《集韵》里有个地名专用字与此音相符:徧布,博故切,地名,周世宗遣将破贼于东徧布洲。从字形看,徧布从水,义是洲名,正是水边通名。黄埔也是水滨的地名。”[4](p.191)

从字形看,云惟利先生所举五个浙江地名均为从水的“浦”。字义上更像是黄埔的“埔”。这些

带“浦”的浙江地名与福建指大片的平地的“埔”似乎有所不同。再考虑到广东(非浙江移民地)也大量使用带“埔”字的地名,云惟利先生将这些发现作为移居地借用原居住地的名称的证据,似乎有些牵强。

相反,对支持“闽语是由中原语演变而来”之说法的学者而言,其理想的考证结果应该是在闽台可找到与中原相同的地名,如西周发祥地——岐山的派生或相关的地名。岐山位于陕西省西部,属宝鸡市。岐山为西周发祥地,因地处岐山(今箭括岭)得名。岐邑为周太王至周文王前期的都邑。周自公刘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传九世到周太王。因受戎、狄逼迫,周太王率众越过漆水、沮水和梁山,到达岐山(今陕西岐山东北)以南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间),兴建居室、城郭,是为岐邑。直到文王攻灭崇国,在该地建成新都丰(今陕西长安西北),才从岐邑迁离。关于岐邑的位置,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在汉右扶风美阳县(今陕西扶风法门),《说文解字》记载在美阳中水乡(今岐山横水河北)。

笔者留意一下,在福建境内有:前岐镇(福鼎),赛岐镇、赛岐港(福安),青岐(金门),安岐(金门),崎沟、高崎(厦门),黄岐(连江),竹岐(闽侯县),魁岐、琅岐镇(福州),岐头村(澎湖),卓岐村(龙海市)。严复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福州市盖山乡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福州船政局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闽江支流马江北岸中岐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举行“琅岐杯”划艇对抗赛的琅岐岛。另外,外地带岐的地名有: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桐岐镇、峭岐镇(江阴市),临岐镇(浙江淳安),广东三水市青岐镇,日本岐阜市等等。

晋江东北的洛阳江及洛阳江上的洛阳桥,当被认为是因为洛阳为河南的古都而被河洛(阳)人照搬原地名的例子。其实,这种研究的完整方法还应搜集到闽语和吴语都不具有同的语音、语词或地名。若这两方面的证据都很充分,便趋向于认同闽语和吴语是亲属,是有别于其他方言的一家人。然而,不支持“闽语是由吴语演变而来”之说法的反方,其策略应是:(1)在福建找到与江浙无关的语音、语词或地名,即福建有江浙无的语词或地名。(2)搜集到江浙有福建无的语音、语词或地名。这两方面的证据越多,闽语和吴语的交集越少。

对支持“闽语是由吴语演变而来”之说法的学者而言,其理想的考证结果应该是只找到(I)和(IV)证据,而找不到(II)和(III)证据(见表1至表5)。反之,对不支持“闽语是由吴语演变而来”之说法的学者而言,其理想的考证结果应该是只找到(II)和(III)证据,而找不到(I)和(IV)证据。可惜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有利于正反双方的四种证据都不难搜集到。以下 $2 \times 2$ 列联表(Contingent Tables)从地名等几个方面列举了这些证据:

表1 地名

		吴 语	
		有	无
闽语	有	(I)鼓山(永康/福州);鳌江(平阳/连江);永安;霞浦(宁波/宁德);洪塘(宁波/福州);江阴;大岙	(II)冠豸山;飞鸾(二都);肖厝(泉州);长寮河(厦门);莆门;埕埔头(福州)
	无	(III)苕溪;甬江;会稽;淳诸;上虞;下邳(江苏);带“剡、婺、衢、泗、缙、介、里弄”的地名	(IV)“劬、察、萨、黔”字开头的地名;带“屯、淀、坝、窟、陵、什、胡同、龟兹”的地名

表2 名词

		吴语	
		有	无
闽语	有	(I)灶前;鸭雄;配(温州/福州:菜蔬);众 生(江浙/闽南:畜生);小肠气(疝气)	(II)树箬(叶);箸箕(勺);熏(香烟);秫米 (糯米);日头(太阳);眠床 <sup>①</sup> ;红毛 <sup>②</sup>
	无	(III)热头(太阳);猢猻(猴子);铜佃银子 (钱)	(IV)炕;老干;单车;牙床;闺女;刘海儿; 西红柿(蕃茄)

表3 动词

		吴语	
		有	无
闽语	有	(I)囤(藏);刨(宰);墩羊(阉割)	(II)截(关灯);填(还)钱;脚溜;冤家;乞 (给);啼(哭);过契(继);驶汝(伊); 奶;惊(怕) <sup>③</sup> ;斟(接吻) <sup>④</sup> ;对手 <sup>⑤</sup>
	无	(III)白柑,也作“宰相”(苏州,上海);汰 浴、豁浴、陆浴(洗澡);黄牛 <sup>⑥</sup>	(IV)抬杠;挑眼(吹毛求疵);泡磨菇;捅 漏子;摆乌龙;炒鱿鱼

表4 形容词,副词

		吴语	
		有	无
闽语	有	(I)爽(舒服);后生(年青)	(II)癫(疯);溪猪(傻瓜);生分(阳生); 齐(漂亮);胚角很歪;小礼(害羞); 左(乖戾,好色);野(很) <sup>⑦</sup>
	无	(III)憨大(傻瓜);价(很)漂亮;苗头;噱 头;温墩 <sup>⑧</sup>	(IV)嫩;美;窝心(感到委屈);喇忽(漫不 经心)

表5 时间

		吴语	
		有	无
闽语	有	(I)明旦	(II)暝晡(晚上);蜀冥(昨天);月尾; 拜六
	无	(III)吉密子(宁波:今天);空朝头(大清 早);夜快头(傍晚)	(IV)今天,早晨,昨天

① 唐李延寿《南史·鱼弘传》：“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

② 红毛(ang mo)已经被澳大利亚的 Macquarie Junior Dictionary[5]收录。其词条的注解为：This word is borrowed into English from Hokkien ang mo kweh and means literally “redhaired ghost”。

③ 闽裔新加坡人常自嘲有“惊(怕)输”和“惊死”(Kiasu and Kiasee)情结。其中源于闽方言的“Kiasu”一词因频繁见于英文书报，已经被澳大利亚的 Macquarie Junior Dictionary[5]收录。其词条解释为：“If someone is Kiasu, they are afraid of losing out to someone else. They are anxious not to be disadvantaged.”有关“惊输”观念的详尽论述，请参见作者“Are Kiasuism and Singapore 21 diametrically opposed in influencing Singaporeans’ decisionmaking?”一文[6]。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的《语言文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说，“斟”(接吻)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语 chium。而作者查现代马来语词典，“接吻”为“cium”。

⑤ 对手：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意为“帮助”；直译成英语意为“give me a hand”；直译成日语意为“手伝う”。若采用 Rips, Shoben & Smith(1973)[7]的方法，请实验被试(subjects)判断闽方言“对手”与其三者之间的语义距离(semantic Distance)，恐怕英语和日语都比现代汉语(对手有竞争者、敌人之意)更接近于闽方言这特有的词。

⑥ 黄牛乃是吴语方言的用法，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称：当人的“责任心差而不履行承诺”，皆可说是“黄牛”。

⑦ 据段开琏著《中国民间方言词典》，野的同义词为：蛮(昆明)；挺(北京)；稀(扬州)；蒙、显(温州)。

⑧ 吴方言中有“温吞水”、“温墩水”的叫法，也是说水不冷不热、微温。《安吉县志》：“水微暖曰温墩。”《越谚》：“温墩水，谓微热水也。”吴语中的“温墩”，还可以形容人之言语不冷不热、含糊不清。如：“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墩之谈，两可之论。”(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

细想一下,采用以上方法来证明闽语和吴语的关系,其证明本身是很不平等的。即,证明吴语是源易,证明吴语不是源难。这好比证明中国有地中海果蝇比证明中国没有地中海果蝇容易得多。证明吴语是源易,这是因为有单向移民的史记在先,只要在福建找到与江浙相同的语音、语词或地名(地中海果蝇),就有理由说这是江浙的产物。但反之并不亦然。

比如,“寮”是闽台很常见的地名专用字。畚族古住房大多是以竹子为架搭成的“悬草寮”。可能是源于“悬草寮”的缘故,带“寮”的地名在福建全都是行政镇以下的小地名。福州北峰山区有上寮、下寮,文革期间被改为“红寮”。笔者念书的延安中学就曾经在红寮的猪姆岭建学农分校。遍布福建各地带寮的地名有:龙岩市下寮村、适中镇板寮;连城梅花山的太平寮;上杭县中寮铜矿;宁化县水茜乡石寮村;泉州的后寮宫;晋江市紫帽镇寮内村;晋江县石脚寮村、土地寮村;南靖县的虎伯寮;南安官桥成竹下寮;安溪县尾寮小区、美寮经济小区;漳州市天宝田寮村;平和县欧寮;南靖县书洋乡下坂寮、田寮坑村;厦门市同安上寮工业小区;南安官桥成竹下寮;诏安县桥东镇下寮村、太平镇麻寮村;九龙江口的上寮军垦农场、寮溪等等。在台湾的带寮地名有:基隆湾内的社寮岛;云林县麦寮乡;台北县贡寮乡贡寮村;桃园县大溪镇瑞源田番仔寮;嘉义县布袋镇的虎尾寮;苗栗县头份镇田寮里;屏东县枋寮乡枋寮村;高雄县大寮乡;新埔镇下寮里;南投县中寮乡、竹山镇木屐寮;台南左镇菜寮乡、学甲镇头前寮等等。

云惟利先生认为:“地名虽较易变,命名的方式和习惯并不易变。大地名比较易变,小地名就不那么易变。”有趣的是,在其他省份倒是有行政镇一级带有“寮”的地名,如:广东省的和寮镇、新寮镇、湖寮镇、巽寮镇、寮步镇;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板寮乡;江西省的寮塘乡;陕西省的王寮乡以及浙江省的船寮镇、下寮乡、渔寮乡、黄寮乡。如果就此把这些带寮地名作为(I)类证据,从而推论吴语是源,恐怕值得商榷。

福建各地的地名各种各样,很有地方特色。这就很容易收集到(II)类证据。最独特的地名应首推平潭的东庠和连城的冠豸山。豸,在此读[zài],因形似古代獬豸冠而得名。以“笏”为地名的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笏石镇和南平大横镇大笏村也很独特。“笏”为古时大臣上朝时拿着的狭长形手板,多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厦门万石山有古景:“万笏朝天”、“中岩玉笏”。又如莆田的“莆”字也是个很独特的地名专用字,只见于莆田、莆口、莆门(福州)和莆美(云霄)。

厝,是安身住处的意思,说闽语的地区至今仍保持这种古称。大陆地区带“厝”的乡镇级行政区仅见于福建省。闽西地名多带“坑”,闽东地名多带“洋”,闽北地名多带“坊”,而闽南地名多带“厝”。如闽清的宏琳厝(号称全国最大古民居);福州的原厝、江厝里、郭厝里、李厝山、卢厝埕;福清的新厝、柳厝;福安的康厝、杨厝边;柘荣县油麻厝;浦城的管厝;建瓯的王厝;政和的余厝柯;将乐的范厝;永安的棋盘厝、柴排厝;莆田的新厝;平潭的北厝;集美的田厝、孙厝村;厦门的黄厝河、叶厝、黄厝、曾厝安、内厝、翁厝、许厝、吕厝、孙厝、何厝、徐厝;金门的林厝、兰厝;南安的卓厝、周厝;惠安的蔡厝、肖厝、潘厝、施厝、邱厝、柯厝、锦厝;晋江的黄厝、苏厝、赖厝、烧厝;石狮的杨厝、卢厝、谢厝、洪厝、莲厝、杨厝、郭厝、赖厝前;安海的高厝围;龙海市颜厝镇;同安的内厝、宋厝、曾厝、萧厝;泉州的戴厝、洪厝、萧厝、万厝埕;永春的石厝;德化的毛厝、王厝山;南靖的吕厝村;邵武的张厝乡等。今日台湾地名之中,有5个泉州厝,3个同安厝,2个安溪厝。新加坡亦有3个“厝”:林厝港(Lim Chu Kang)、蔡厝港(Choa Chu Kang)、杨厝港(Yio Chu Kang)。这些“厝”大都是同姓人聚居的地方,人们一看到这些地名,便会联想到姓氏根源与宗族的关系。

另一个未见于浙江的小地名专用字是“埕”。闽语中,一小块空地谓之“埕”,也指蚌田。带“埕”的地名几乎遍布福建全境。如:永安市吉峰村大甲埕;建宁县金溪乡斗埕村;建瓯东峰镇石埕村;福鼎市沙埕镇;福鼎店下镇后埕村;宁德市漳湾镇南埕村;南平大横镇埂埕村;古田县黄田镇莪洋柳埕;德化县南埕镇;福州市的蓬埕、陈厝埕、吴厝埕、下体埕、埕埔头、兴化埕、三角埕、阔埕街、白沙埕

园顶、鳌峰洲人民埕;闽侯县鸿尾乡埕头村;闽侯县白沙镇埕元村;连江县筱埕镇;永泰县樟城镇后埕新村;永泰县梧桐镇埔埕村;德化县南埕镇;莆田北高镇埕头村;莆田三江口南埕村;莆田涵江三角埕;莆田涵江区白塘镇岱埕自然村;莆田县新度镇洋埕村;仙游县郊尾镇埕边村;诏安县大埕湾;晋江安海镇大埕头;泉州市的驿内埕、伯府埕巷、洪衙埕巷、新路埕、许路埕、花巷许厝埕;石狮市新华三落埕;石狮市锦尚镇深埕村;石狮市祥芝镇深埕村;石狮镇蚶江镇深埕、新深埕;南安市水头镇埕美村、埕边村;厦门市的梧桐埕、东埕北门、钱炉灰埕;惠安县螺城城仔埕;惠安县张坂玉埕村;惠安县埕边盐场;惠安县螺阳镇蒋吴村后埕自然村;东山县陈城镇白埕村、埕英村;龙海市石码镇李厝埕、大埕。另外,台湾带“埕”的地名有:高雄市盐埕区;台北市大稻埕;南投县水里车埕村;新店市柴埕路;台南麻豆镇大埕里等等。

至于(Ⅲ)类证据,为人熟悉的京剧《沙家浜》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浜是典型吴语。《崇明县志》:“半港曰浜。小河。”带浜的地名遍布江浙。如上海的肇嘉浜、陆家浜、周塘浜、张家浜、梨园浜、张华浜、浣沙浜;无锡市周山浜;常熟市沙家浜镇、董浜镇;嘉定戩浜镇、封浜镇;松江新浜镇;桐乡市河山镇东浜头村;长兴县雉城镇南张浜村;嘉兴马家浜;杭州市祥符镇方家塘村楝树浜;杭州市拱墅区半山石塘村沉家浜;海盐县海塘乡宜介浜村;温岭市钓浜镇;海盐百步镇顾家浜村;浙江青浜岛(号称中国最东边的住人岛)。而在同样河流众多的福建就没有这个“浜”。

浙江的艮山、甬江是独一无二的。浙江境内有几处带“岙”的地名,如中岙、后岙、观岙、大岙、小岙、花岙、毛家岙、南岙、岙山等等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比较独特的地名包括:苕溪、会稽、淳诸、上虞等等。

总之,用相关地名分析法容易肯定吴语是源,很难否定吴语不是源。其原因如下:(1)在福建找到与江浙无关的语音、语词或地名,即福建有江浙无的语词或地名,却不能全盘否定“共有地名”的事实。这好比澳洲英语虽有独特的 dingo, bingoo, Coogee, Wonlongaon, Bondi, Wage Wage, jackaroo, esky, cockatoo, bush tacker 等等,其英语还是英国英语;(2)找到江浙有福建无的语音、语词或地名,辩方仍然可以说,不是所有地中海果蝇都带入中国。

## 二、中原、吴语(特有)古字古音分析

云惟利先生《海南闽语语词的来源及闽语和吴语的关系》一文在分析语词时,所举的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是“厨房”:文昌话说“灶前”,福州话说“灶前”或“灶前头”,苏州话说“灶前头”。这种从海南追溯到福建,再追溯到江浙并止步于江浙的证据当是最完美的范例。这类令人信服的例子还有“藏”:文昌话、潮州话、厦门话、福州话、温州话、苏州话都说“园”。《集韵》:口浪切,音亢,藏也。闽吴两语都说“宰”为“劊”。福州人说:蚀本生意没人做,劊头生意有人做。

由“字”的例子笔者联想到“数”的例子。在吴语里,十位数“二十”常用“念”,如“念一”(二十一)。在福州话里,数字“一”和“二”有两种读法:“蜀<sup>①</sup>”“两”或者[ei][nei]。而二十几的读法只读“[nie]几”,如“[nie][ei]”(廿一),不读“两几”。特别要指出的是,其他十位数,如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七十几、八十几、九十几都可以读“十”或者不读“十”之音。惟独二十几永远是不读“十”。其廿的发音[nie]像是吴语“念”。

受云惟利先生文章的启发,以后每每读些研究文章时,多了一份心思。这居然也有了收获。如读叶舒宪《古代语言文化中的阉割世界》[8](pp. 77-80)一文,得知宋人朱翌所撰笔记《猗觉寮杂记》卷下云:“物去其势,豕曰豮赐,牛曰犗,马曰扇,鸡曰敦,犬曰阉。”笔者这才明白,原来面对“赐、犗、

<sup>①</sup>《尔雅·释诂》:“蜀,壹也。”

扇、敦、阍”等书面刺激,福州人全都以一个“敦”字发音对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在福州的三坊七巷仍然可见以敦鸡、敦猪为职业的人的身影。敦鸡的人,一手扶骹踏车(脚踏车),一手持竹萧,一阵竹萧声吹过,街头巷尾便知敦鸡服务上门了。

笔者从小住在福州宫巷11号沉厝(现改为26号,并于199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隔壁10号林厝为沈葆楨丈人林则徐家族的故宅),那是一座明式建筑。因为厝大人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居委会开会时曾以“进”为单位来分组。笔者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看不懂“进”字时的疑惑。因为不管是用普通话还是用福州话来读这“进”字,都不是笔者所听和所说的。直到有一天读了林再复所写的《闽南人》一书中有关“闽南语与古音”一节,方恍然大悟,原来长辈们所说的是头落、二落、三落、四落,四落透后。该书说:闽南语“一座”房屋称为“一落”,而把大厝分为“前落”与“后落”,亦系据杜牧阿房宫赋:“蜂房水涡,矗不知几千万落。”[9](p.495)

宫巷故厝里每落之间的高门槛也给笔者小时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些非常高的门槛最终因行走不便而锯了。有人以为闽语中门槛的“槛”应为“𠂔象”,但据发音,笔者猜测当为“垫”。

云惟利先生《海南闽语语词的来源及闽语和吴语的关系》一文花了很大篇幅说明,最能看出闽语和吴语之关系的是两者间自成体系,且源于六朝吴语的人称代词“侬、依、伊”(与官话传来的“我、你、他”并行)。然而,有证据说明:闽语各方言一律用“伊”作为第三人称,而在大多数的吴语中说“渠”;第二人称在闽语中基本上是“汝”,而在吴语中有可能是“尔”,也有可能是“汝”[10](pp.100-121);第一人称在闽语中是“我”,“我”在福州话中说[ɲai]。在三身代词后面附上“各侬”,可以表示复数。如:我各侬、汝各侬、伊各侬;又如:两家侬(我们,大家)。福州话第一人称的谦称形式有“奴”、“依”、“依家”。

由此看来,闽语的第二、第三人称代词虽然很古雅,但是,汝(第二人称)和伊(第三人称)并非为吴语所特有,因此,不足以断定吴闽两语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能从中看出吴闽两语之间有密切关系的人称代词只有“依”。笔者愚昧,自拜读了云惟利先生两篇相关论文之后,方知道“我各侬、汝各侬、伊各侬以及谦称依”当中是“依”而不是“人”。笔者曾努力尝试区分“各侬”中的“依”和福州话中的“人”的发音,结果仍然是依人不分。特别是笔者幼时使用谦称时,心里还一直以为用的是一个“人”字。随之产生的疑虑是如何证明此“依”非“人”。

依笔者愚见,吴语(如上海话)可将“依”直接作“你”解,但是福州话绝对无此用法。“汝各侬”(或云惟利先生所认为的“你依”)中,“依”的用法充其量只是第二人称复数表示法,即“各人”或“们”的意思,“各人”比“各侬”更像是集体代词。

另一个想法是,如果“我各侬、汝各侬、伊各侬以及谦称依”当中一定是“依”,不是“人”,那么,“依”和“人”发音无区别的福州话里到底还有没有“人”?这好比新加坡的英校生曾抱怨,用英文学中国历史,韩(han)汉(han)分不清。有可能产生此类问题的说法有:人团书(小人书)↔依团书;人客↔依客<sup>①</sup>;人前(众人面前)↔依前;人里(别人家里)↔依里。以下童谣也有可能产生类似问题:“砻砻粟/粟砻砻/糠养猪/米养人/鸭姆生卵乞主人/主人毛着厝/骑牛骑马去上墓/墓里一条葱/股腔顿两孔/墓里一条草/股腔顿青垢”<sup>②</sup>。另外,闽语第一人称的其他说法似乎与吴语更不搭界。何棉山在《闽文化概论》[11]一书中说,民间有用“阮”字表示“我们”。福州话第一人称的倨称形式有“郎罢[ɲou][ma]”、“老婿[lai]”等。唐代诗人顾况的《囡》诗:“囡别郎罢,心摧血下。”自注云:“囡,音蹇,闽俗呼子为囡,父为郎罢。”“囡”通用于整个闽语区,而“郎罢”似乎是福州话所独有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方言特征词之一。“郎罢”即福州话的“父亲”,自称“郎罢”与北方人自称“老子”一样,倨傲而且粗鲁。自称“老婿”则更显得粗野。

<sup>①</sup> 人客:客人。杜甫《感怀》:“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白居易《酬周从事》:“腰痛拜迎人客久。”

<sup>②</sup> 砻、人、依同音。乞:给。股腔:屁股。青垢:青淤。谨采录此福州童谣献给我的人生启蒙老师——陈春妹依姆。

其实,福州话中还另有一个俗称:老[sái]。在大学念书时,班上只有一位家住台江区(传统且民上岸的区)的同学能运用自如。有可能是因为古越语“底层”的缘故,这“有音无字”的[sái]<sup>①</sup>似乎未有文字记载。

除了如云惟利先生所说的最能看出闽语和吴语之关系的人称代词“依、依、伊”,福州话中对两性的称呼亦最能看出闽语和吴语、闽语和中原语之关系非同一般。

战国时期(前334),越王勾践七世孙无疆为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王族南奔,同原有的“闽族”人结合,后称“闽越”人。后来,统治闽人的便是勾践的后裔无诸。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向福建进军;翌年,废闽越王无诸,封为君长,而后建立闽中郡,闽越成为华夏民族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秦亡后,无诸因反秦有功,被汉高祖封为闽越王。汉武帝元封元年,汉灭闽越国,立为冶县,这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县,标志着封建社会制度在福州的确立,闽越族统治集团逐渐汉化。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载:“闽,东南越族蛇种。”《汉书》说:“汉高祖五年(前202)以亡(无)诸为闽粤(越)王,都东冶。”“东冶”即福州冶山,为屏山南麓一小山阜,相传春秋时欧冶子曾经在此铸剑,故名。

据说,五代十国后期,闽国被南唐所灭。唐兵打到福州时,掳“诸娘人”和“诸娘团”(因是无诸后裔,故称)为妻妾奴婢。人们见唐兵来了都惊叫:“唐部人,唐部团来啦!”从此,“诸娘人”、“诸娘团”、“唐部人”、“唐部团”就成了女人和男人的称呼。

“诸娘人”、“唐部人”这一阴一阳的人称代词,在汉语中绝无仅有。亦十分对称地、不偏不倚地支持了“闽语是由中原语演变而来”和“闽语是由吴语演变而来”之说法的两方学者。正因为福州曾是闽越王定都处,持“早期闽地居人所说的确是吴语”观点的学者,若不把研究重点放在福州十邑,也不应漏过福州十邑。居住着“诸娘团”和“唐部团”的福州十邑当是两派之争的坚矛和厚盾。

综上所述,古字古音分析方法也不尽如意。因为即使在闽语中找到中原、吴语(特有)古音,也不能断定现代闽语是由中原话或吴语演变而来,而非只是受中原话或吴语的影响。这种解释似乎很荒诞,但也不无道理。例如,大部分新加坡人(如闽人)当为华人(如吴人)的移民后代。Singlish是新加坡人说的英语,但它肯定不是汉语。假若新加坡人像古巴华人那样继续保持只识政府工作用语而不识汉语的势头(有的青年大学生连中文姓名都没有或不愿有),后人是否可根据 Singlish 的语音(e.g. the discourse final lexeme -lah, -hor, -meh, -mah, -loh, -leh and -hah)、语法(e.g. no see no frighten)或地名(e.g. 蔡厝港,黄埔)推断:Singlish不是由英语而是由华语演变出来。

闽方言如何形成以及何时形成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作为研究闽语和吴语的学者之一,云惟利先生在揭示闽语和吴语的关系中,已经将揣测落实到实证,并拿出了有力的证据。在这些基础上,有兴趣的学人跟进研究,将来也许能将所有证据集腋成裘,弄清闽语和吴语的来龙去脉。

### [参 考 文 献]

- [1] 云惟利. 从历史地理看闽语和吴语的关系[J]. (新加坡)新南威尔士大学语言文化学报, 1996, 1(1): 117-164.
- [2] 云惟利. 海南闽语语词的来源及闽语和吴语的关系[J]. (新加坡)新南威尔士大学语言文化学报, 1996, 1(2): 163-222.
-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语言文学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① 马来语“我”和“我的”均为“saya”。印度尼西亚语“我”为“saya”或者“aku”。



- [4] 牛汝辰. 中国地名文化[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 [5] Macquarie Library. *Macquarie Junior Dictionary*[M]. North Ryde, N. S. W.: Macquarie Library, 1999.
- [6] Li, S., & Fang, Y.. Are Kiasuism and Singapore 21 diametrically opposed in influencing Singaporeans' decision-making? [J]. *Psychologi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the Orient*, 2002, 45(1), 34-45.
- [7] Rips, L. J., Shoben, E. J., & Smith, E. E.. Semantic distance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semantic relations[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73, 12, 1-20.
- [8] 叶舒宪. 古代语言文化中的闽割世界[J]. 东南文化, 1996, (2): 77-80.
- [9] 林再复. 闽南人[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3.
- [10] 潘悟云. 温、处方言和闽语[A]. 梅祖麟. 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 第1辑[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11] 何棉山. 闽文化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徐 枫]

## Min Dialect and Its Evolution: A Discussion

LI Shu

(Faculty of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on,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Abstract:** Contradictory to the assumption in the mainstream linguistics literature that Min Dialect evolved from ancient Mandarin spoken in the middle part of China (i. e., Henan province), some recent studies argue that Min Dialect evolved from Wu Dialect rather than ancient Mandarin. There is some evidence revealing that, since the reclamation of Fujian, the majority of the new settlers had migrated from Zhejiang, which is in turn reflected in the similarity of naming dwelling between the residents in Zhejiang and the immigrants in Fujian. Inspired by such a finding,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closely the existing evidence by analyzing place names in Fujian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as well as analysing character-pronunciation. It is then reasoned that, for those wh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Min and Wu are from the same dialect family, the preferred evidence would be the finding of various character-pronunciation, accent and place name which could only be found in both Fujian and Zhejiang but not elsewhe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ose who are against the argument, the favourite evidence would be the collection of character-pronunciation and place names which could only be found in Fujian but not in Zhejiang or the collection of character-pronunciation and place names which could only be found in Zhejiang but not in Fujian.  $2 \times 2$  contingent tables demonstrate that both supportive and unsupportive evidence could be easily granted by looking into both Min Dialect and Wu Dialect. In addition, some very unique character-pronunciation (e. g., the verbs “kiss” and “give me a hand”) and place names (e. g., “埕” and “厝”) used in Fujian are deliberately illustra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ing that the semantic distance between Min Dialect and some non-Chinese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Japanese and Malay) is much closer than that between Min Dialect and other Chinese dialects. In summary, mixed evidenc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Mandarin and the two dialects is somewhat at variance with the assertion that, analogously, ancient Mandarin could be seen as grandfather, Wu Dialect as father and Min Dialect as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Key words:** Min Dialect; ancient Mandarin; Wu Dialect; place name analysis; character-pronunciation analysis